

塔尔图符号学视阈下的翻译研究^{*}

姚婷婷

摘要 除了从纯语言视角出发,当代翻译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对于非语言成分和超语言因素的描述使得翻译研究开始延伸到普遍符号学范畴。符号学家们也开始认同翻译是符号的基本实践,符号意义的创造存在于翻译和解释翻译行为的另一套符码体系中。本文试图将当今国际符号学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塔尔图符号学派在文化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在符号学视域下重新看待翻译的本质、目的以及翻译各参与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交际情况。

关键词 塔尔图学派 符号学 翻译研究

DOI:10.16238/j.cnki.rla.2017.03.019

The Translation Study from the Semiotic Perspective of Tartu School

Yao Tingting

Abstract Besides the perspective of pure linguistics, modern translation theory studies have developed a lot of new characteristics. The boundary of translation activity has been extended into semiotics when we describe some nonverbal elements and trans-linguistic factors. Semioticians also agree with the fact that translation is the basic practice of symbols and the meaning of symbols emerges from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 other system of symbol codes. This paper tries to apply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semioticians, especially the methodology of cultural semiotics and biosemiotics, into translation study. And we attempt to re-examine the essence and purpos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of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in translation.

Keywords Tartu school; semiotics; translation study

引言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把翻译视为是一种语言的转换活动,各种依据语言学原理的翻译理论层出不穷。然而翻译是否只是一种语言活动,还是一种语言与生命交融的活动呢?这一问题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符号学的介入,已经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翻译的语言与生命交融研究的转向也越来越清晰。在研究意义的产生过程和现象的基础上,符号学研究把翻译研究的门槛极大地拓展到生命的起源以及生命的嬗变进程。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无疑在这一片新的领域中颇有建树,尤其是文化符号学的代表人物洛特曼(Juri Lotman)“符号域”

思想的引入,以及生物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乌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üll)的“符号域”理论被奉为经典。在上个世纪末洛特曼去世以后,新塔尔图学派的符号学研究也并非是另辟蹊径,而是融合了洛特曼提出的符号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且在“环境界”(umwelten)和“符号域”(semiosphere)理论的基础上考察环境文化的根源问题。在描述“环境界”之间的信息交换过程中,塔尔图符号学的新锐学者卡拉维·库尔(Kalevi Kull)和彼得·特洛普(Peeter

^{*} 本文是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SK2016A0789)的阶段性成果。

Torop) 等对人类语言翻译行为进行了符号学范畴下的诠释,创造性地提出了“前翻译”(生物翻译)和“真正的翻译”(语言翻译)的分类,并推演了二者外延与内涵的异同。至此,我们的译学研究也进一步从符号学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一张前所未有的翻译符号学研究的蓝图正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一、翻译的意识性

翻译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以人类语言为核心,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出发研究诸如翻译对等和翻译转换等一系列问题。这一趋势从 20 世纪初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现代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中,更为科学的、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包括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和话语理论等,也被运用得淋漓尽致,细致地描述了翻译行为的方方面面,并通过微观分析考察了一系列语言层次的对等问题。显然,语言是一种文化的唯美表现形式,但文化特征的形成又根植于包容它的自然环境,翻译则承担了信息交换与传播的媒介。因此,当代译学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纯语言研究的范畴,必然会探索新的研究路径。符号学的迅猛发展无疑为翻译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而翻译理论中一些长期未得到重视的基本方面,例如译者身份与反身份的建构以及翻译与环境、生命活动的关系问题等,正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由边缘走向中心。

雅各布逊曾站在皮尔斯符号学的立场上,指出任何语言符号的意义都在于将该符号进一步翻译为另一种符号,任何单词或词组的意思,既是语言事实也是符号事实。在解释语言符号时,他将翻译分为三种类型,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1](114)}1976 年召开的“文学与翻译”大会则被普遍认为是翻译研究历史上的分水岭,盖斯特伦(Aloysius van Kestern)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尝试去建立一整套适用于翻译理论的符号模型”,^{[2](48)}符号学进入翻译学领域的构想初见端倪。图里(Gideon Toury)关于“从文化视角看待翻译”一文被收入西比奥克

(Thomas Albert Sebeok) 编纂的《符号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他参照了结构符号学家们的经典理论,如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进一步论述了翻译与符号学携手的可能。^{[3](1111-1124)}西比奥克的学生戈尔莱(Dinda L. Gorfée)长期以来也致力于从事符号学和翻译问题的理论研究,她肯定了符号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之间的合作是有意义的,她认为把语言看成是人们思考、交流、互动的符号系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不意味着其他符号就站在了对立面,文字语言或口头语言的理论是研究其他更广泛的符号理论的先决条件。因为符号学能为翻译研究成果的巩固提供一个理论支撑,而翻译反过来又可以充当符号行为或符号学理论中的实例。^{[4](226-227)}

许多语言学家们从目的论出发,把翻译简单地归纳成一种交流过程,而坚持实用主义观点的理论家们则认为翻译是一种翻译过程的确定并在期间建立一系列连续事件的行为。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学者们在解释符号时,十分注重环境中的自我传播问题,他们认为翻译是意义创造的过程,自我意识的传播构成了翻译能力的基础。有意义的文本的创造,需要译者具备翻译不少于两套符码和信息的能力。库尔和特洛普认为,大部分文学翻译理论仍然无法突破自我意识的束缚,如果考虑到无意识的翻译,那么翻译的类型则可以区分为前翻译(protranslation)^①和真正的翻译(eutranslation),也可称其为生物翻译(biotranslation)和语言翻译(logotranslation)。^{[5](34-35)}通过意识特性进行区分的翻译行为要求翻译必须存在于有生命的物体中。翻译行为无法发生在非生命体中。

^①库尔和特洛普认为的“前翻译”,或称“生物翻译”是“无意识”的翻译,这里的“无意识”并不等同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无意识”概念。前翻译是指存在于任何生命系统中除人类语言之外的符号传播,即非语言的翻译,通常具有直接和非隐喻性的意义,可以不通过任何技术手段就解释出另一个符号系统的部分含义。例如风头山雀在遇袭时发出的警报声被褐头山雀听见,褐头山雀将此信号翻译为有可能存在危险。^{[5](36)}

此外,语言翻译相较于无意识的生物翻译而言,是有意识的。而有意识的翻译并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假定了翻译中无意识成分的存在。因此,翻译的过程通常同时具备生物翻译和语言翻译,二者无法割裂存在。

与之前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截然不同,如果按照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观点,我们可以把前翻译与语境进行对应,把真正的翻译与文本进行对应,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前翻译并不先于真正的翻译,是真正翻译的前提条件;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前翻译创造了真正的翻译,包括所有在翻译行为中的参与者。实际上前翻译总是对真正的翻译施加着莫名的影响。虽然我们很难探究前翻译多大程度上或者如何具体地影响真正的翻译,但是作为翻译行为发生的译者,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知识语境,身份和意识形态等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传统翻译理论相对忽视前翻译,也就是语境的影响,而在符号学的翻译观中,语境可以被看成翻译的环境界,反而是冰山没入海中的部分,坚实庞大,不容忽视。

真正翻译的意识性还表现在它必须在意识的指导下完成,去形成解释层面的框架。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原文、读者都可以成为决定真正翻译的主导者,翻译方法无非是一套技术程序而已。技术上的错误不足为惧,比如词语或时态的不妥,可以被替代,但是对于原文的感知,尤其是节奏和语调等,是要依靠译者直觉去感知的,而不是通过技术识别的,一旦出现错误就要重新翻译。

意识性因素使得译者感知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句法层面,但除了意识的影响因素,前翻译与真正的翻译之间的区别有时显得模棱两可。在人类语言的翻译中,我们已经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译者至少能够掌握两种语言——源语和目标语。某些场合下译者即便对其中一种语言掌握甚少,翻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可译和不可译的界限往往也莫可名状。库尔和特洛普在进一步讨论语言翻译时也提出了另一个疑问,源语与目标语的界限。源语和目标语的相异是可译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洛特曼认为环境界相同则翻译交流不

存在。因此,翻译的存在首先需要两个不同的环境界,其中一个环境界中的信息在另一个环境界中进行传播,且传播可以被理解,那么这样的翻译才是有意义的。^{[5](35)}

二、翻译与环境界

翻译既然包括了前翻译和真正翻译的翻译过程,自然可以看成是不同环境界间的信息传播,那么在考察人类语言翻译时,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环境界的界限。当乌克斯库尔描述人和动物的世界时,他引入了“环境界”这个综合性的基本概念。环境界是生命体的世界,是已知的世界,或者说模塑世界。它由符号关系、生命体的辨别和生命体辨认或处理的一切组成。^{[6](314-315)}除了乌克斯库尔,西比奥克、霍夫梅耶(Jesper Hoffmeyer)等人也把环境界看成是存在于有生命的物体的符号系统内部的世界。在人类语言翻译中,环境界中的符号关系构成了个体的语言域,每个生命体的语言域都是排他的和相对封闭的。

翻译的主导者,原文作者、译者、目标语读者,任意二者之间必须拥有互相关联或重叠的环境界。关联和重叠关系意味着这些环境界或多或少拥有相似的功能圈,尤其是符号系统中专门类型的符号,在语言翻译中特别指句法符号。句法符号是人类语言翻译中特殊的存在,它能体现翻译是否充分,也能决定翻译不仅可以取得单个符号层面的成功,也可以取得整个文本层面的成功,换言之,可以达到技术层面和感知层面的双重融合。然而,翻译活动中某个生命体的环境界中可能缺少句法层面的符号关系,但是翻译行为仍然有存在的可能性。因此,翻译意识先于句法符号。

当生命体把一个环境界中的语言符号传播到另一个环境界中去,如果它们能够被辨认出,则可获得翻译性。翻译存在与否的一个假定性判断就是被传播的符号关系能够继续存在于相应的环境界且持续发挥作用,以及其他翻译参与者对它们的辨认情况。不同环境界中一一对应的符号关系或者共有的符号关系往往最容易被辨认出,这意味着文本的可译性

较高;反之,不同环境界相差甚远的功能圈,符号关系中错综复杂迂回的对应关系,使得生命体在辨认或处理符码过程中遇到很大麻烦,则文本可译性较低。例如我们在英文中很容易为“钢笔”找到“pen”来一一对应,而“麒麟”常常被译作“Chinese unicorn”(中国的独角兽),中国神话中祥兽的“麒麟”并不存在于西方文化中,目标语读者作为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在辨认来自与已不同的环境界发来的信息时,辨认出现偏差,翻译性受阻。

又比如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中,一一对应的语言符号关系通常少之又少,译者在自身环境界中通过感知较为特殊的文体、节奏与文学意境等特征来进行符号编码与转码,而读者在所处环境界中对被传播的符码进行辨认,如果辨认速度较快,我们可以断定该翻译首先取得了句法上的成功,如果在辨认过程中还引起了读者某些心理方面的反应,尤其是获得了满足和愉悦,则可认为该译本还取得了解释层面的成功。如果辨认的速度较慢,我们则认为文本的翻译至少在句法上引起了读者的不适,严重的结果会造成读者在心理上的抵抗,进而放弃深入阅读。比如一些科技类文本的翻译往往会因为晦涩的术语过多给译者和读者都造成麻烦,尤其是在辨认这些文字符号的意指时还需要相应的认知能力做为基础,因此如何高效地转化不同环境界中的符码信息并加快辨认速度是译者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因为辨认的速率决定了译本是否能被读者接受。

在翻译实践中,越是由较少符号组成的简单符号系统,特别是两个环境界中的符号系统有较多的共用符号,翻译的难度越会呈几何级数增长。符号使用的重叠会使意义的生成更为多变和模糊,辨认的准确性就会受到影响。句法系统越是缜密越是对翻译大有裨益,它可以限制信息在不同环境界中的对应范畴,提高符码在规定范畴内的辨识度。

一个翻译理论家描述的翻译事实应该包括译者和目标语读者对本身所处环境界的塑造。环境界作为翻译过程中创造意义和诠释意义的主体,和存在于读者与译者的内在世界共同存在。环境界的因素是客观的,它作为外

在的对象,会对译者和目标语读者特有的感知与制动装置产生影响,这些影响由“建造计划”(building plan)进行组织和调节。

无论是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还是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都相当关注翻译的技术层面,要求译文与原著在“语内和语际连贯”上保持一致,尽可能地“忠诚”原文。而按照符号学的观点,我们可以推断译者的翻译能力是可以被建造和培养的,也会随之动态地改变对目标语读者环境界的塑造。技术层面的成功可能属于“建造”的时间问题,当目标语读者的环境界得到拓展,对译者所传播的意义辨识效率提高,亦或者意义在传播的过程中得到更广阔的衍生,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好的翻译”。

在某些情况下,当环境界内部的动态发展在技术层面上统一时,翻译研究的地位就会发生改变,特别是新翻译媒介的出现和新技术手段的革新为符号学和翻译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机器翻译智能到取代人工翻译,我们在前文提到的翻译的“意识性”问题是否有新的解答。我们不禁要发问,翻译过程中的机器是否也隶属于一个与人类活动一般无二的环境界,机器对于不同环境界中信息符码的转换又遵循怎么的原则;而翻译机器作为生物环境中的非生命体,它的运转机制对于“前翻译”和“真正翻译”又有怎样的影响。

三、翻译的交际模式

洛特曼关于意义生成机制的观点以及在其后期作品中对于交际模式的构建,为新塔尔图学派的学者们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他关于意指过程的思想包括了三个基本原则,即“代码复数”、“不相容”以及“自我交际”。人类语言翻译普遍存在于各个有关语言学的问题中,我们在讨论翻译的意义发生机制的时候已经预设了译者至少掌握两种以上符码系统,翻译过程是两种以上符号系统的转换和传播,其诠释也不仅涉及到语言内部问题还涉及语言外部问题。这一点与洛特曼的“代码复数”在原则上要求意指过程发生在不止一种或至少两种语言之上是保持一致的。^[7]

对某一翻译事实的反映需要源语和目标语共同发挥作用已经得到众多翻译学者的认同。解构学派的翻译家们站在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层面讨论文化差异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又把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与翻译策略联系起来去看待翻译语言的“变形倾向”(deforming tendencies)。^{[8](288)} 翻译活动中语言代码的多元性特征有助于对语言世界本身和语言外部世界进行共时研究。

前文提到了翻译的前提是存在两个不同的环境界,用洛特曼的观点看就是这两个环境界之间“不相容”,进行有意义交际时要使用两种互不相容的代码,从宽泛的意义去看,即两套代码拥有不同的功能圈,不同的逻辑意义和不相重叠的使用范畴。有效翻译要求信息发出者即源语作者、信息传递者即译者和信息接受者即目标语读者之间至少使用两种不同符号系统,这些符码之间有共性和关联,但范畴互不重合。正是这种翻译参与者间符码不对称的差异关系,使得翻译成为一种生成新意义的行为。

在洛特曼的人类语言符号学中,自我交际被看成是发生在生命体内的译码,是最普遍的交际形式。解释符号系统内部多维空间中的诸多层次需要作为感知基本成分的翻译来实现。洛特曼的自我交际模式将意义生成机制定义为两种模式化类型的结合:我与自我的交际和我与他/她的交际。^{[9](21-35)} 自我交际是任何交际的起源,它令双重的符码的传播和重构以至于信息的翻译成为可能。在语言翻译中,译本意义的生成过程除了起始于译者与自身的交际以及译者与译本的交际,还需要将原著作者与译者的交际以及原著作者与目标语读者的交际纳入其中。

这些模式中意义生成的机制不尽相同,其实体表现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一部著作可能有多个译本,而同一个译者也会译出不同的版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译者与作者交际的过程中二者的交流仅仅通过原文文本来实现,译者对于文本的感知以及技术层面上的策略选择使得代表着原文本的符码信息在另一个环境界中传播。而在译者与目标语读者的交

际中,对译本符码的辨认是目标语读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环境界中符号系统的复杂程度有时会超出译者的翻译能力,技术层面的过错会令交际的困难增加,阻碍意义按照正确轨迹生成。相反,如果译者与自身的交际更为充分或更有效应,则能有效地提高目标语读者对原著的辨认。

考察翻译的交际模式,令我们得以重新看待翻译的基本原则问题。尤金·奈达(Eugene Nida)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提出翻译的“动态对等”原则,认为接受者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和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存在的关系相同。^{[10](139)} 在符号学视角下,翻译行为更关注交际模式下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符号在不同环境界中的转换与传播以及目标语读者对其辨认的过程都是为了在交际中创造意义。译者、译本和目标语读者之间除了关系“对等”还应存在着随时被创造出的无限衍生意义。

四、翻译、对话和语境

在文化符号学中,语境是文本产生的前提条件,语境并不会先于文本出现,然而每一个文本为了自身的存在都需要一个载体,这个概念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共存,同时它又是其他文本发展的结果。尤其在洛特曼晚年的著作中他不止一次强调如果没有一个他者文本的存在,文本、理性、文化的三种功能以及传播、记忆和创造都将不复存在。

因此,塔尔图学派的学者们不会只讨论“只言片语”,即独白式的语言,他们认为还必须关注“对话”,所有的言语不在对话情境中都是没有意义的。塔尔图学派的最重要特点就在于认为复杂的符号系统是由简单的符号系统组成,初级的符号系统需要被简化成可以组成符号域的子系统。无论是分析符号域还是主体世界,都需要新的范式和逻辑,就是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之上。对话意味着信息的传播,这是意义出现的过程。洛特曼和乌克斯库尔都肯定了“翻译”是信息传播也就是“对话”的

开始,并为此建立了不同的模塑类型。

洛特曼在论述其符号域理念的时候,多次点明了“对话”的重要地位。他认为“没有交流的意义是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许会说对话先于语言,并导致语言的产生……从人性到单个文本再到全球符号的统一,符号域的所有层面都是一个内部相联系着的符号域组成的整体,与此同时,这些符号域参与到对话以及对话空间中去。”^{[11](218,225)}大多数学者认可“对话”是符号域的分类特征,而驱使符号域内在动态过程的原则之一是表明两种语言翻译机制的“界限”。符号域是封闭的系统,它的外部边界是通过脱离周遭环境建立其结构的统一性,内部边界则是在符号域中把不同的符号系统区分开。因此,从“对话”机制的内涵看,翻译研究的基础不是把翻译描述为一种文化语言边界间的文字信息交流,而是隶属于特定“文化—语言”域的文字信息或口头信息在对话空间中的交流。翻译情形应当在翻译行为发生前被理解,确定翻译有进行的必要。翻译行为的发生还需要存在着两种“既相似又相异”的语言。

洛特曼认为对话发生需要两个必要前提:首先是一段时间内的同质性和组成要素的异质性;然后对话交流中有两个正好相反的趋势,其一是为了加深理解促使对话参与双方的相似,其二是为了提升交流信息的价值,扩大二者之间的相异。^{[12](481)}同理,如果我们把“符号域”与翻译的“语境”进行对应,翻译行为的发生也需要这样的前提条件,翻译的诸参与者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认知范围既要有交集也要有不重叠的“域”,认知能力的匹配或接近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译者乃至源语作者在译本中传达的信息和构建的语境,因为从译者主体论的角度去看,译者的认知能力过低,翻译技巧过于拙劣必然会使读者与译本之间的“对话”困难重重。而认知范围的相异通常要求译者在翻译行为发生的整个时间段内,在特定的语境中拥有超越读者的“见闻”和卓越的语言文字转换技巧,毕竟无法吃透原著且语言功底薄弱的译者难以创造出“合适的翻译”。

与皮尔斯倡导“竞争”的对话不同,洛特

曼认为对话既不是“零和的”,对话参与方之间也不存在“竞争性”。^{[12](482)}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单纯地去判断最终的译本一定丧失了原著中的一些符码信息,这对于译者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翻译活动诸参与者以译本为基础进行的“对话”也不是“零和”或极赋“竞争性”的,一方所得不见得是一方所失,所有参与者应当通力合作,扩大相似性以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换言之,翻译活动的参与方应当有意识地扩大所在环境界之间的交集以简化不同环境界之间的交流程序,使得各个环境界之间的边界更容易被打破达到互通有无。另一方面,“对话”的本质要求我们在趋向于相似的同时突出相异来提升信息的价值,毕竟翻译不仅仅是词语的“互换”或“重写”,译本的异质性是其维系与目标语读者联系的基本要素。

诚然,译者通过对译本的翻译营造出了全新的语境,但译者有意无意所传递的意识形态等倾向在与读者进行信息交流时或“对话”时会极大地影响目标语读者,会导致目标语读者的价值观向译本的语境接近。不得不承认,有些情况下,出于某种翻译目的的译者可以“操纵”这种趋同的程度,具体表现为“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取舍。除非译本的语言断断续续或过于晦涩,阻碍“对话”的进行,否则读者通常不会质疑译本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因为读者在阅读译本之前已经预设了译者比自己“水平高”。另一方面,译者乐于用提高译本“异质性”的方法来吸引目标语读者,读者的好奇心是促成阅读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一旦“同质性”完全占上风,翻译过程中“对话”的这两个趋势之间就会出现紧张的关系,“对话”或交流就会仅仅流于形式;如果“异质性”最终得胜,“对话”或交流会由于缺乏共同点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按照符号学的观点,笔者认为相互关联的译本与语境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文学文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对话”关系。当译本处于它生存的语境时,为读者所熟悉,并不需要传达所有的意义,它们的关系是补充性的,仅仅将对方认出就已足够,比如“葛朗台”在汉语语境中几乎等同于“周扒皮”的吝啬鬼

形象,并且在读者的认知中得以符号化,因此读者并不会再刻意探究原著作品《欧也妮·葛朗台》整个故事情节或是在刻画视钱财如命的葛朗台之外是否反映了法兰西复辟王朝时期土地、金融资产阶级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等深层次问题。分析这种对话关系时需要符号过程的调节,这一过程还应包括原著和原著作者,从而是多重的:(1)语境(2)原著(3)原著作者(4)译者(5)读者。每个参与者都有着各自的符号活动,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有一种极端的关系就是译本可能会危害源语作品的语境,比如《马可波罗游记》畅销欧洲,被翻译成几十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译者穷其所能地用华丽的辞藻描绘着书中所记载的神秘的东方大汗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契丹的每座城市都远比威尼斯富饶,东方的女人温柔多情,奇异的风俗(以妻女供游客淫乐)可以使游人在契丹享用数不尽的美女。这些译本在西方引起了轰动,上至当权者下至平民百姓都趋之若鹜。至此之后,一队又一队的远洋船队朝着东方驶进,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掀起了海外殖民扩张的浪潮,东方诸国在炮火和铁蹄之下摇摇欲坠,建筑被烧毁,人民被奴役,再不复马可波罗笔下的金碧辉煌。

结语

在后结构主义时代,文化的动态发展趋势无疑向着文化内部的高度聚合以及延伸到不同文化间交界的中间地段,文化的统一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翻译的语言学派,还是阐释学派,亦或是功能学派,都不再把翻译活动简单化一为一个文本到另一文本的转换。文本在环境界中的实体地位随着翻译手段、翻译媒介和翻译工具的创新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文本的产出也呈现为文本、新媒体、话语等多种形式。一个语言文本可能以多种方式同时出现在一个既定文化系统中,这些表现方式包括了文字的、多媒体的、视觉的、视听的等。各式各样的文本组成了一个内部组成关系松散的集合,它们作为一个共时的符号整体在被接受的过程中,或在文化的记忆里发挥作

用,而原始文本符码信息的排列以及被翻译的顺序则变得无足轻重。

翻译在环境界内部进行的过程与不同环境界之间的翻译过程是同样重要的,因为这反映了语言文字在环境界和交流技术革新影响下的变化,也反映了语言文字与环境界中其他符号系统如何进行联系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翻译技术和媒介的更新以及翻译在相应环境界早期发展阶段所积累的经验可以令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的“语内翻译”,而翻译活动过程中许多模糊的层面会在新的条件下变得清晰。既然翻译活动的周遭环境与以往已经大不相同,新的条件下我们对翻译行为参与者的要求也需要相应地调整,萨迪斯特(Elin Sütiste)和特洛普强调了以往的译者训练方法需要被重新审视,从教学法上看,第一阶段的重点是强调语内翻译,包括文字语言之间的信息交换和对于“文本的操纵”,第二阶段是引入符际翻译,不仅引入到教学层面还要引入到翻译的实践方面去,比如视听翻译和文本译成相应的视觉环境(例如报纸的排版)。^{[13](202-203)}

以符号学为立足点的翻译研究从根本上有别于翻译语言学派的诸多理论,意义的创造和衍生成为符号学翻译研究的核心,这无论是对翻译学中各项术语的重新界定,还是对翻译原则和方法的重新规约而言,都会使翻译主导者更多地考虑纯语言研究未能顾及的领域,包括关注翻译活动与人类环境的关系,翻译参与者之间的交际情况等。

信息大爆炸时代,翻译研究亟待新思想、新观点。在后结构主义时代,洛特曼和乌克斯库尔的符号学研究方法和观点,成就了新塔图学派的中兴之路,使得生物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成为符号学体系研究中又一令人瞩目的焦点。而翻译研究也像一株斑驳却吐露新芽的树木急需移植到新的肥沃土壤中。采用符号学的方法论来看待翻译问题,进而探讨人类语言与生命的交融问题,无疑符合当代学科研究的创新理念,这将为译学和符号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是意义深远的尝试和创新。

参考文献

- [1] Jakobson, Roma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C].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 [2] van Kesteren, Aloysius. *Equivalenc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urce Text and Target Text: Towards a Typology on the Basis of Semiotics* [M]. In James S. Holmes, José Lambert and Raymond van den Broeck (eds.).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New Perspectives in Literary Studies*. Leuven: Acco, 1978.
- [3] Toury, Gideon. Translation. *A Cultural-Semiotic Perspective*. In T. A. Sebeok (ed.).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 [M].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86.
- [4] Goriée, Dinda L..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M]. Amsterdam & Atlanta: Rodopi, 1994.
- [5] Kull, Kalevi & Torop, Peeter. *Biotranslation: Translation between umwelten* [M]. In Susan Petrilli (ed.). Tra Segni. Roma: Meltemi editore, 2000.
- [6] Kull, Kalevi & Lotman, Mihhail. *Semiotica Taruensis: Jakob von Uexküll and Juri Lotman* [J] //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2012.
- [7] [爱沙尼亚] 卡拉威·库尔、王永祥: 洛特曼在意指过程模式化方面的遗产 [J] // 俄罗斯文艺, 2012 年第 3 期。
- [8] Berman, Antoine. *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 [C].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 [9] Lotman, Juri.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M]. London: I. B. Tauris, 1990.
- [10] Nida, Eugene. *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 [C].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 [11] Lotman, Juri. On the semiosphere [J] // Clark, Wilam trans, *Sign Systems Studies*, 2005 [1984], Vol. 33(1).
- [12] Laas, Oliver. *Dialogue in Peirce, Lotman, and Bakhtin: A comparative study* [J] // *Sign Systems Studies*, 2016, Vol. 44(4).
- [13] Sütiste, Elin & Torop, Peeter. *Processual boundaries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J] // *Semiotica*, 2007, Vol. 163(1/4).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